

躍進型「統計」體制的 形成及其後果

• 趙勝忠

1958年的工農業大躍進帶來了統計工作的大躍進，從而產生了躍進型統計體制。躍進型統計體制，特指在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以黨政領導的意圖和指示為主臬，以證明大躍進路線的正確性為宗旨的統計體制。剖析它的形成、特徵和後果，不僅有助於深入理解歷史上的大躍進運動，而且對認識現實中的特定現象也不無鏡鑒之用。

躍進型統計體制形成的背景

躍進型統計體制的形成決不是歷史的偶然，從統計工作自身的縱向發展來看，躍進型統計體制的形成與統計領域的反教條主義鬥爭一脈相承，換言之，它是統計工作「中國化」鏈條上的重要一環。

建國初期從蘇聯「移植」過來的集中型統計體制，強調業務工作的垂直領導和管理制度的集中統一。總起來說，它與當時的經濟體系基本適應，尤其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與執行發揮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但是，它也表現出脫離實際、不能較好地為地方服務的一面。在農業合作化中曾出現過這樣的極端事情，河北省某縣縣委要求縣統計科調查社員成份卻遭到拒絕，只好通過公安局取得有關資料^①。在這種情況下，統計工作的改革就成為必要。

糾正集中型統計體制教條主義傾向的努力，從它形成之日就已經開始，並一直堅持，甚至可以這樣說：反教條主義鬥爭一直是統計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尤其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開斯大林神話的蓋子以後，對蘇聯經驗的反思又加大了反教條主義的力度。從這層意義上說，統計工作改革是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體制創新之一。不幸的是，大躍進運動的狂瀾扭轉了它前進的方向，集中型統計體制開始向「中國化」的極左方向大踏步前進。

躍進型統計體制，特指在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以黨政領導的意圖和指示為主臬，以證明大躍進路線的正確性為宗旨的統計體制。從統計工作的發展來看，躍進型統計體制的形成與統計領域的反教條主義鬥爭一脈相承。不幸的是，大躍進運動的狂瀾扭轉了它的方向，集中型統計體制開始向「中國化」的極左方向大踏步前進。

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帶來的政治、經濟以及整個社會格局的巨變，提供了躍進型統計體制產生的沃土。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一直非常重視「政治掛帥」的共產黨，1949年掌握新社會航向以後，就更有條件發揮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②土改、肅反、三大改造等一系列的勝利使北京堅信：只要政治掛帥，就能所向披靡，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基於這一認識，國家機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緊緊圍繞政治軸心運轉，統計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

大躍進運動既是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次經濟嘗試，又是一次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政治試驗，因而這既迎合了擺脫貧困落後的急切心情，似乎又能驗證共產主義路徑的正確性。因此，大躍進就成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試驗，它要求「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為之服務，統計工作從中得到的指令是：「黨政領導需要甚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甚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裏，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裏。」^③後來又增添了方法上的指導：「要根據黨的指示和實際工作需要辦事，黨叫怎樣做，就怎麼做。」^④只有做到這一點，統計工作才能鼓足「大幹快上」的幹勁，才不會束縛群眾的手腳。因此，統計工作就需要唯大躍進運動的馬首是瞻：既能「實事求是」地反映一日千里的躍進形勢，又能創造性地發揮動員群眾的作用，確保大躍進戰略所需要的熱情。

為把統計工作完全納入大躍進的軌道使它成為服務於大躍進的「馴服」工具，政權一方面通過思想教育實現軟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動用國家機器實行超強控制。沒能領悟大躍進運動真正含義或者敢於拂逆這一運動的人，就被批為「觀潮派」、「算帳派」，甚至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甘肅省鎮原縣1958年發生的一起冤案就是極好的例子。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如實上報該縣嚴重缺糧的情況，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全縣先後有3,000多人受到批判，1,650人受株連，1,503人被捕（後死於獄中333人）。僅在7-9月就有870多名農業社幹部被當作「白旗」拔掉，而他們恰恰是農村收集原始資料的主力軍^⑤。與此相反，「有些不說老實話、作假報告、誇張成績、隱瞞缺點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和處分，反而受到不應有的表揚和提拔」^⑥。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計委下達的指令具有較強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各級政府、各部門都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除非遭遇大的自然災害等特殊情況。大躍進的宏偉計劃是「趕英超美」的激進主義情緒的產物，它在充分相信人民的創造性的同時卻忽視了客觀規律，因而多是超出實際可能的「高指標」。在1959年8月26日的人大常委會上，周恩來提出了躍進的量化指標。「工業每年增產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躍進，增產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就是大躍進，增產百分之三十以上就是特大躍進；農業每年增產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躍進，增產百分之十五以上就是大躍進，增產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特大躍進。」^⑦在實行兩本帳的情況下，這一量化指標使得高指標愈演愈烈。為了「插紅旗」或者為了避免「拔白旗」，各級各部門「不顧一切地採取了各種組織手段，去堅持執行這些任務」^⑧。

大躍進運動既是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次經濟嘗試，又是一次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政治試驗，因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統計工作從中得到的指令是：「黨政領導需要甚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甚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裏，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裏。」

與此同時，統計管理也下放權力，國家統計局要求地方統計部門以90%的時間完成地方任務，上報的統計數字要經黨委批准，甚至統計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時制宜的靈活性」，從而便利了地方黨政領導對統計工作的干預。當鼓足幹勁、埋頭苦幹仍然無法跟上大躍進的步伐時，黨政領導只好借助統計工作的支持。1958年的糧食高產豐產典型，大都是用「併田」的辦法製造出來的，如湖北省隨縣金屯鄉將9.75畝稻子移栽到一塊田裏，放出了畝產六萬斤的「衛星」^⑨；也有一些是按每畝密植株數乘以每株產量計算出來的，如山東壽張縣畝產三萬斤的「高產衛星」；還有篡改統計數字的，如湖南省平江縣就直接顛倒了1957年的高產衛星和1958年的低產數字。在這種情況下，統計部門承受了很大壓力。根據薛暮橋回憶，1958年8月有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向他訴苦：「說省委要統計局報假帳，不報就要受處分。」^⑩

管理體制的變化帶來了統計工作自身運行機制的變化。統計工作不再算「經濟帳」，而要算大躍進運動的「政治帳」，確切地說，是否由算「經濟帳」為主，改為算「政治帳」為主。就大煉鋼鐵運動而言，「主要收穫，不在生產了多少鋼鐵，而在鍛煉了全國人民，摸到了群眾運動方法辦工作的道路。使廣大農民掌握了工業生產知識」^⑪。否則，就是「只看局部，不見整體」，就是「缺乏政治觀點」^⑫。

算「政治帳」嚴重扭曲了統計工作立身之本的實事求是原則。浮誇數字反映出來的「成就」與熱火朝天的群眾運動，使北京更願意接受與大躍進理念相吻合的統計資料。浮誇虛報成了「實事求是」，而實事求是卻被判為「右傾保守」，這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空氣：互相「攀比搞浮誇，看誰吹得高，誰吹得大，誰就有本事，誰的思想就符合形勢要求」^⑬。大躍進期間，國家統計局下達的統計任務都要求「實事求是地反映大躍進的偉大成就」。在這一暗示下，統計人員只有「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共產主義作風，才能跟上形勢的需要。「思想解放」為浮誇風打開了方便之門，使統計數字成了真實的謊言。

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在改變統計工作運行環境的同時，也把統計工作融入了大躍進的洪流。

根據薛暮橋回憶，1958年8月有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向他訴苦：「說省委要統計局報假帳，不報就要受處分。」算「政治帳」嚴重扭曲了統計工作立身之本的實事求是原則。這就造成浮誇虛報成了「實事求是」，而實事求是卻被判為「右傾保守」。於是互相「攀比搞浮誇，看誰吹得高，誰吹得大，誰就有本事，誰的思想就符合形勢要求」。

統計對大躍進運動的不斷調適

在大躍進初期，統計部門內部對於統計工作能否躍進與應如何躍進的認識還存在很大分歧。有不少人認為統計工作是特殊的業務部門，不應「隨風倒」，即使在支持躍進的人中間，佔上風的觀點也不過是「更多、更快、更準確」地提供統計資料。

1958年2月的國家統計局機關大會上，薛暮橋局長一方面肯定統計工作必須大躍進，一方面又堅持「決不是每來一個運動，就發一套報表，作一次調查」。因為「領導機關所需要的資料，很多是可以從現有資料中整理得出的」^⑭。這種認識反映在實踐上，就是針對工作中的不足進行微調。國家統計局先是號召各級統計部門克服因機構精簡和從業人員減少而帶來的困難，轉變作風，提高效率，完成1957年的年報任務；同時還精簡了一些不合需要的工業、基建、物質供應等報表。

毛澤東在1958年嚴厲批評「墨守成規」的統計工作，指責從蘇聯「照搬」的統計制度壓抑了幹部群眾的熱情和積極性。這反映在薛暮橋的講話中，就是「方向道路是主要的，業務是次要的」，「我們搞統計工作是為人家服務的，不是為自己服務。要不要，要甚麼，要問人家。計算方法，計算口徑，也是如此，為誰服務，就去問誰。」

這一時期的重頭戲是推廣河北省加強農村統計工作的先進經驗，即在黨委領導下，建立由縣統計科、鄉秘書、社文書和村記工員組成的統計網。經過國家統計局的大力推廣，「河北經驗」走向了全國。到1958年3月，已有十幾個省市前往河北參觀學習，不少省市根據「河北經驗」進行了改革。如江蘇省把「生產進度統計」全交給了統計部門，雲南等省省委、省人委通過了《關於改進統計工作以適應大躍進的報告》。這些做法僅僅是業務層面的微調，與大躍進的要求還相去甚遠。

為了推動統計工作的大躍進，毛澤東在這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嚴厲批評「墨守成規」的統計工作，指責從蘇聯「照搬」的統計制度壓抑了幹部群眾的熱情和積極性。4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統計工作的兩種做法〉的社論，把「河北經驗」提昇為三點要求：(1) 把統計工作同黨的中心工作結合起來，同群眾的生產高潮結合起來；(2) 抓住政治思想領導，講方針、方向，不講或少講具體方法；(3) 依靠地方，依靠群眾。來自外界的强大壓力迫使統計部門主動順應大躍進的形勢。薛暮橋4月初在國家統計局機關大會上作了反教條主義的報告，掀起了批判教條主義的高潮。為了「猛燒教條主義、徹底解放思想」，國家統計局於4月16-23日又召開了五次反教條主義的大會。國家統計局及地方各級統計局還張貼出許多大字報，狠批「僵死」的規章制度。

隨着大躍進的升溫，統計部門對統計大躍進的認識也呈水漲船高之勢。這反映在薛暮橋6月份的講話中，就是「方向道路是主要的，業務是次要的」^⑨。「我們搞統計工作是為人家服務的，不是為自己服務。要不要，要甚麼，要問人家。計算方法，計算口徑，也是如此，為誰服務，就去問誰。」^⑩這篇講話表明密鑼緊鼓的宣傳鼓動已經初見成效。

標誌着全國大躍進高潮到來的，是6月份在河北召開的全國統計工作現場會議。會議打破了原來的躍進標準，認為「統計工作是否躍進，既不在報表數量的多少，也不在時間的遲早」，重新確立了躍進的兩條標準：「第一是政治領導業務，同群眾的生產高潮結合起來，及時掌握生產進度，發動群眾評比，黨政領導需要甚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甚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裏，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裏」^⑪。第二、「在各級黨委的經常領導下，由統計部門統一組織，結合群眾生產運動，發動廣大群眾積極參加統計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貫徹執行統計工作的群眾路線」^⑫。最後，與會代表信心百倍地呈上了保證書：「向毛主席保證：苦戰三個月，實現全國統計工作的大改革、大躍進！」^⑬

保定會議後，在「學河北、趕河北」的號召下，全國統計部門掀起了一場大躍進的競賽。為了放統計衛星，各地紛紛成立「躍進辦公室」，制訂「躍進計劃」。江蘇省還提出一整套行動口號：「政治掛帥，不斷革命，生產躍進，統計躍進，生產元帥，統計先行，工農統計，一馬當先，各項統計，全面躍進，苦幹一月，喜報進京。」^⑭

統計工作競賽高潮掀起後，北京仍不斷施加壓力，以使統計工作更快地跟上大躍進的步伐。《人民日報》在8月13日發表社論，號召「全黨全民辦統計」，意欲借助群眾運動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動躍進；國家統計局則通過檢查評比的方

式自上而下地引導。國家統計局9月3日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在9月25日以前檢查和總結統計工作「大改革、大躍進」的情況。在這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統計工作駛上了大躍進的快車道。會後僅一個月，湖南和山西就率先交上了圓滿的答卷，其他各省也緊隨其後實現了保證。

在這場改革中，統計部門根據大躍進的需要窮盡可能地「完善自我」，從業務內容到制度方法都進行了力度很大的「改革」。無論是統計內容的增減還是指標體系的更改，都以滿足大躍進為第一需要。北戴河會議部署了深翻土地、大煉鋼鐵以及人民公社化運動，統計就增添了深翻土地進度表和人民公社建立情況調查表，鋼鐵進度統計也從月報先後改為十日報、周報和日報。

在統計方法上，國家統計局不僅同意各地黨委廢除不合自己需要的方法，還鼓勵各地在方法創新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1958年10月的全國省市統計局長會議上，薛暮橋指出：「過去一套正規的方法制度，已不能適應需要，必須採用一些靈活方法，也不能依靠國家統計局來修訂改變方法，主要靠各省自己創造。」^②

經過這一輪的躍進高潮，統計工作的確改變了「冷冷清清」的狀況，走上了生產運動、政治運動的第一線。然而，統計工作大躍進的負面影響很快顯現了出來，統計數字質量下降的陰影迅速籠罩了大江南北。雖然「衛星上天」、「元帥升帳」的喜報迭傳，一些頭腦尚清醒的人已經開始考慮提高統計數字的質量。1958年9、10月份，河北省涓縣、灤平縣和晉縣分別發出「關於加強統計工作的領導，迅速提高統計數字的質量的指示」。陝西華縣也通過試點的方法探索如何提高統計數字質量。浙江蘭溪縣則把11月定為「提高統計資料質量運動月」。

基層的統計「打假」引起了高層的注意，並融入了高層從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毛澤東在11月的武昌會議專門談到作假問題。出於維護大躍進的矛盾心態，他一方面強調要「老老實實」，另一方面卻又認為完全不相信虛假數字就犯了「機會主義」錯誤。針對這一情況，1959年4月召開的國家統計局長座談會經過認真討論，提出了提高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建立準確的人民公社統計工作，做好農作物產量調查工作以及整頓工礦企業統計工作等問題。國家統計局還提交了100篇反映大躍進中實際存在問題的報告。其中，《關於鋼鐵工業的幾個問題》和《女職工人數的增長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等都敲響了大躍進的警鐘^③。

囿於當時的形勢，統計工作的整頓都是一個模式：一方面勇於承認虛假數字的存在，並採取一定的措施提高統計數字的質量；另一方面，統計工作又不能懷疑更不能否定大躍進運動。這一兩難處境一直持續到1959年8月的八屆八中全會。

八屆八中全會提出的「反右傾、鼓幹勁」政治任務，使統計工作重新「左轉」，進一步突出為大躍進服務的作用。國家統計局檢討了上一階段暴露問題的報告，認為這是由於「政治覺悟不高」而向大躍進「吹了幾口冷風」。而且，國家統計局不僅帶頭寫了十幾篇報告，從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基本建設等方面全面論證總路線的正確性，還通知各地統計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們動員組織全體統計工作人員，在黨的領導下積極行動起來，拿起統計武器，（為）堅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④

雖然「衛星上天」、「元帥升帳」的喜報迭傳，一些頭腦尚清醒的人已經開始考慮提高統計數字的質量。基層的統計「打假」引起了高層的注意。毛澤東在1958年的武昌會議專門談到統計資料作假問題。出於維護大躍進的矛盾心態，他一方面強調要「老老實實」，另一方面卻又認為完全不相信虛假數字就犯了「機會主義」錯誤。

在躍進型統計體制下，統計工作必須堅持「政治領導業務」的原則；「統計工作必須站穩黨的立場，運用統計資料反映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正確性的貫徹執行情況，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衛社會主義」；統計工作必須成為牢牢地控制在共產黨手中的「馴服工具」和「有力武器」。

從1959年10月全國省市統計局長會議上強調「加強統計工作的黨性」，直至大躍進結束，統計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用毛澤東思想徹底改革統計工作」，即「要把毛主席的思想、風格、語言貫徹到統計工作中去，作為進一步提高統計工作的具體要求。要以毛主席的思想、語言、風格作為檢查衡量我們的工作的標準」^{②4}。

1960年，國家統計局借「反三風」、「反五多」的東風，強化統計工作的統一歸口管理，刪簡統計報表，但是，在「繼續躍進」的號召下，統計工作又只能「不斷革命、不斷前進」。這次努力再次證明，在躍進型統計體制內進行的調整已經回天無力。1962年，統計工作實行「一垂三統」（業務垂直領導，統一管理編制、幹部和經費）的管理體制後，躍進型統計體制才退出了歷史舞台。

新統計體制的特徵和影響

統計工作大躍進的初衷是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統計體制，改變統計工作「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傾向。通過開展中心工作進度統計，廢除不合需要的統計報表，加快統計資料的上報速度等方式，統計工作的確改變了這一傾向，並進而走上了生產鬥爭和政治鬥爭的第一線，成為共產黨領導大躍進的重要工具。在這一過程中，躍進型統計體制三個特徵逐漸鮮明起來。

首先，在躍進型統計體制下，統計工作必須堅持「政治領導業務」的原則。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統計工作不僅是各級黨政決定政策、編制計劃、指揮生產的有力武器，同時也是向人民群眾進行宣傳，鼓舞人民群眾響應黨的號召的有力工具。」^{②5}為此，「統計工作必須站穩黨的立場，全心全意為黨的總路線、為黨的領導工作、為計劃工作服務；必須按照黨的指示辦事。運用統計資料反映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正確性的貫徹執行情況，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衛社會主義」^{②6}。這樣，統計工作必須成為牢牢地控制在共產黨手中的「馴服工具」和「有力武器」。

圍繞這一宗旨，統計工作必須為生產鬥爭、政治鬥爭服務。1959年國慶節前夕，為滿足領導需要和對國內外進行宣傳，江蘇省統計局部署了對托兒所、幼兒園和公共食堂進行一次性調查的任務^{②7}。更為典型的是，雖然事實早已證明了烏托邦色彩濃厚的人民公社在農村根本行不通，1960年4月的全國城市統計工作會議還堅持認為「1958年和1959年農村人民公社的偉大實踐，充分證明了人民公社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無比的優越性」，並部署城市人民公社的調查統計工作。從方法上看，「政治領導業務」最好的註腳是賈啟允在1959年11月全國省市統計局長會議上的總結。在分析大躍進時，他強調要運用當時流行的認識框架，即「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建設事業中，成績、勝利總是主流，總是九個指頭，而缺點總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在他看來，搞準確數字「也是一個上下左右審查研究核對的過程。不能盲目地相信我們下邊統計人員報上來的數字都是絕對準確的，因而堅持自己的數字，不虛心考慮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黨的領導的意見，這是不對的」。違背這一原則的做法被指責為「為統計而統計」、「缺乏黨性」。

其次，統計工作的首要任務是中心工作的進度統計。「中心工作是黨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一定條件下的主要工作，必須是全黨全民全力以赴的；及時而正確地開展了中心工作，就可以把黨的整個工作帶動起來，迅速向前推進。」^⑳出於指導生產的需要，從北京到基層各級領導部門都非常重視中心工作的進度統計。為了推動農具改革，《人民日報》從1958年7月24日到10月9日就公布了五次全國農具改革進度表。同期，還公布了鋼鐵生產、土地深耕等進度表以配合當時的中心工作。

大躍進期間，中心工作不斷變化，僅全民大辦就有十幾個，如全民大煉鋼鐵，全民除四害，全民大辦文教，甚至還有全民寫詩等。這些中心工作需要統計部門及時地反映進度情況：全民大煉鋼鐵，就及時反映「鋼鐵元帥升帳」的喜報；全民除四害，就提供又出現了有多少「四無縣」。與此相反，常規統計則受到輕視和削弱。總而言之，統計工作就要做到：中心工作開展到哪裏，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裏。

躍進型統計體制的第三個特徵是大搞群眾運動，掀起群眾辦統計、用統計的高潮。為打破所謂「少數專家壟斷統計」的局面，統計工作大膽吸收廣大群眾參與。到1958年9月，河北一個省就有30多萬脫產和不脫產的統計員，全省70%的地方都建立了「軍事化」的統計網。據統計，全國在1959年秋收產量調查工作中約有1,600多萬人參加（單是四川、湖南兩省就各在200萬人以上）。這一年的年報工作也非常廣泛地發動了群眾，例如甘肅省參加年報工作的達到50多萬人，河北省有20多萬人直接參加年報編製工作，其他各省的情況也大都如此。

群眾辦統計、用統計的另一個表現是遍布各行各業的統計評比。通過「抓兩頭、促中間」，統計評比發揮了動員群眾的作用，並推動了「大躍進從一個高潮走向另一個高潮」。評比中不僅採用了評比圖、躍進門、標兵旗、光榮榜等多種多樣的 forms，而且評比除廣泛應用於經濟部門，還涉及到愛國衛生、文化革命、技術革命、獻銅獻鐵、認購公債等方面的工作，甚至在1958年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中也開展了「比政治掛帥、比躍進、比幹勁、比鑽勁」^㉑的群眾性評比運動。

在大躍進運動的推動下產生的躍進型統計體制不僅深刻改變了統計工作本身，還積極地反作用於大躍進運動。對統計工作而言，新體制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一場大混亂。由於權力下放過多，地方黨委對同級統計部門的行政干預取代了國家統計局的業務監督。地方黨委既可以廢除國家統一的報表，又能夠根據需要進行方法「創新」，最後還負責上報數字的審核把關。經過大躍進的設計，統計機構遭到嚴重削弱，有的地方甚至被取消。國家統計局1963年的一份權威文件不僅證實了這一點，還列出一個統計人員減少的數字，「石油部等十二個部、局，1962年5月份統計人員比1957年減少40%」^㉒。統計力量越薄弱，濫發報表、「數出多門」的現象就越嚴重。在1960年5月的全國農村統計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廖魯言指責有些地方竟然有十幾個「運動辦公室」向下發統計報表，他認為這種亂搞「運動」統計的做法是不妥當的。同時，統計資料上報還盲目地追求高速度。許多省市的調查往往在一天就結束，甚至全國性的調查也要求一天就結束。

躍進型統計體制的特徵是大搞群眾運動，掀起群眾辦統計、用統計的高潮。為打破所謂「少數專家壟斷統計」的局面，統計工作大膽吸收廣大群眾參與。據統計，全國在1959年秋收產量調查工作中約有1,600多萬人參加。通過群眾辦統計、用統計，發揮了動員群眾的作用，並推動了「大躍進從一個高潮走向另一個高潮」。

躍進型統計體制造成虛假數字的大面積出現，統計數字「隨風倒」，因而成了統計工作的一大景觀。「所謂統計數字『隨風倒』，就是我們的統計數字，常常受某些領導幹部的主觀思想作風的影響而忽高忽低，『熱漲』、『冷縮』。」^①因此，不僅前期的「高產衛星」和「鋼鐵衛星」大有水分，而且後期的統計數字也很有問題。1960年，南京20多個街道工廠「原報5月份工業總產值4,421萬元中，實際產值只有562萬元，需要核減的產值為3,859萬元，即核減87%」^②。關於1960年上半年的工業總產值，蘇州市統計局估計需要核減16%，長春市統計局自報要核減19.7%。

1958年夏收中「高產衛星」競相上天，造成糧食問題已經解決的假象。面對「把地球上的人統統集中到中國來也夠用」的糧食，毛澤東主席甚至開始思考「糧食多了怎麼辦」。在這種盲目樂觀的情緒支配下，「少種、多收、高產」成了農業的指導思想。同時，高徵購和「放開肚皮吃糧」又使農民缺糧，這就造成三年困難時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更嚴重的影響還在統計領域之外。躍進型統計體制挖掘出社會動員的功能並把它發揮得淋漓盡致。「放衛星」使「爭先進、趕先進」的意識深深植根於廣大幹部群眾的心中。在這一意識的激勵下，人們都唯恐落後於大躍進的步伐，無不爭先恐後地、有創造性地完成北京的每一項指示。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躍進型統計體制不僅烘托出「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氣氛，而且激發了群眾「力爭上游」的熱情，使「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狂熱口號應運而生，從而助長了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

虛假數字反映出來的錯誤信息直接導致了決策的失誤。1958年夏收中「高產衛星」競相上天造成糧食問題已經解決的假象。面對「把地球上的人統統集中到中國來也夠用」的糧食，毛澤東主席甚至開始思考「糧食多了怎麼辦」。在這種盲目樂觀的情緒支配下，「少種、多收、高產」成了農業的指導思想，1959年農村開始推行農田「三三制」原則，即三分之一種植，三分之一綠化，三分之一休閒。同時，高徵購和「放開肚皮吃糧」的政策又使農民手中很快就開始缺糧，造成三年困難時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鑒於當時顯現出來的工業遠遠落後於農業的形勢，北京又決定「以農業逼工業」，興起全民大辦鋼鐵的運動。為保證「鋼鐵元帥升帳」，不僅9,000萬人一齊上陣，土法洋法同時上馬，而且各行各業都為1,070萬噸鋼讓路，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經濟形勢的極度惡化。數字的大躍進帶來了經濟的大躍退。「1962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又退回到1958年的水平。工業每年只增長3.8%；農業每年還下降了4.3%。」^③

躍進型統計體制，雖然因其負面影響從形成之日就遭到抵制並最終被拋棄，然而，完全清除它帶來的影響，尤其是混亂思想，卻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直到1978年撥亂反正以後，特別是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的頒行，才為統計工作開創了一個有法可依的新局面，統計工作終於煥發出新的活力。

註釋

① 參見胡開明：〈進一步提高思想認識，鞏固和擴大河北省統計工作改革的成果〉，《統計工作》，1958年第13期，頁3。

②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3。

- ③⑦⑩ 薛暮橋：〈苦戰三月，改變全國統計工作面貌，實現全國統計工作大躍進！〉，《統計工作》，1958年第14期，頁3：3：4。
- ④ 《賈啟允局長在全國省市統計局長會議的講話紀要》，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長期卷212。
- ⑤ 參見〈「大躍進」期間的鎮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頁48-53。
- ⑥⑧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99：432。
- ⑦ 周恩來：〈關於調整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主要指標和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1959年8月27日。
- ⑨ 〈關於切實注意各地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問題的批語〉，同註②書，頁614-15。
- ⑩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256。
- ⑪⑫ 《薛暮橋局長在全國省、市、區統計局長座談會上的報告紀要》，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長期卷187。
- ⑬ 〈駁工業戰線上群眾路線的懷疑派〉，《紅旗》，1958年第12期，頁4。
- ⑭ 靳佔修：〈浮誇風憂思錄〉，《中國統計》，1995年第5期，頁17。
- ⑮ 薛暮橋：〈統計工作如何大躍進〉，《統計工作》，1958年第5期，頁4。
- ⑯⑰ 〈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在河南省統計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統計工作》，1958年第12期，頁1：3。
- ⑱ 〈向毛主席保證：苦戰三個月，實現全國統計工作的大改革、大躍進〉，《統計工作》，1958年第14期，頁1。
- ⑲ 《江蘇省統計工作現場會議開幕詞》，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長期卷188。
- ⑳ 《反右傾、鼓幹勁、為加強統計工作的黨性而努力！》，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長期卷212。
- ㉑ 《國家統計局通知》，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長期卷213。
- ㉒ 《賈啟允局長在全局黨員科長以上幹部會上的講話》，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長期卷256。
- ㉓ 山西省統計局：〈開展鋼鐵進度統計和統計評比〉，《統計工作》，1958年第22期，頁15。
- ㉔ 《國家統計局二月四日局務會議紀要》，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長期卷256。
- ㉕ 參見《江蘇省統計局、江蘇省婦聯、江蘇省衛生廳聯合通知》，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永久卷218。
- ㉖ 陶然：〈為實現全黨全民辦統計而鬥爭〉，《統計工作》，1958年第17期，頁4。
- ㉗ 〈大批促進派當選人民代表〉，《人民日報》，1958年7月4日。
- ㉘ 國家統計局：《十三年來我國統計工作的經驗總結》（1963年5月），頁18。
- ㉙ 《國家統計局賈啟允局長1961年12月27日在全局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紀錄》，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長期卷256。
- ㉚ 《請切實注意檢查工業總產值計算中的問題》，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133，長期卷271。
- ㉛ 房維中：〈我們所經歷的六個五年計劃〉，《計劃經濟研究》，1983年第5期，頁4。